

在中国驻印军高射炮连任少校翻译官的岁月

○黎模慎（1944经济）口述 刘伟华整理

我1918年出生，湖南湘潭人。抗战爆发时我正在南京读中学。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后日军攻占上海，跟着西进直逼南京。当时南京局势非常混乱，很多学校都迁到内陆地方。我和家人为避战乱回到长沙。国民政府的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于国家形势险峻，他动员省内的中学二、三年级学生和大学一年级学生下乡教育和训练民众，准备抵抗日军的侵略。湖南省内的中学生主要派到当地乡下，我们从南京来的学生多被派到靠近湘北的乡

村，因为当地的方言接近国语，我们与们较容易沟通。我被分派到澧县乡下工作，做到第二年农历新年才返回学校。我们一班同学在1938年毕业后被介绍到湖南省抗战时粮食储运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专责抢购省内的粮食，运到湘西的地方，作为战时政府和军队备粮之用。

到了1939年，我参加全国大学统一考试，最初派到四川大学，但那时大学里的官僚气很重，我觉得气氛不好，所以二年级后转校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修读经

特殊要求。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怀念当时的生活。

第三方面，处理好与附近农民的关系，照顾农民的利益。四川说起来是天府之国，实际上农民穷得很。四川人养猪，人跟猪是住在一个房子里头，在同一个屋檐下，猪住在二层，人跟粪坑在一层。所以我们要尽量支持农民发展生产。

我们修一条上山的路时，必须截断农民的水渠，所以我们就帮农民另修了一条水渠，保证他们灌溉农田。我们6字班有一位水利系的毕业生调来工地，我们就安排他专门负责附近农村的水利工程，因为四川的水利非常重要，冬季蓄水，种一季稻等要靠水利。涪江的水流比较急，我们就利用这个特点搞了一个提水站，使水不用动力就提到山坡上可以灌溉农田。因为

这些，我们跟农民关系非常融洽。

大概在1966年初，从清华来了一批毕业生，我们就派他们中的一部分到农村去，去每个大队兼一个副队长，帮助农民搞管理。我那时还兼任公社的书记，副书记是一位团中央下放干部，她管具体事儿，我就算挂个名。总之，我们非常重视处理跟农民的关系，保护他们的利益，农民确实太穷了。

1966年7月，我被学校派来的工作组押解回校，当时是乘坐火车硬卧，我的铺在中间，上下两个铺是监视我的学生。火车中途停站，他们给我买过一根冰棍，望着手里的冰棍，我想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跟这冰棍一样冰凉了呢？

从此，我就结束了在651工程历时一年半的工作。

济。时任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声誉很高。1943年美国等参战盟军准备对日本反攻，需要大批懂得英语的人协助工作。当时美军主要负责后勤补给和训练中国军队，包括使用美式装备。在中国军队里美国的军官主要担任联络官，与美方指挥部联系，将军事指令告诉中方部队指挥官，所以中间需要翻译官协助双方沟通。梅贻琦校长在1943年11月通知我们1944年毕业的同学参军担任翻译官。我们首先参加昆明翻译官训练班，专门学习军队一般用语和军事武器专有名词，以及学习一些军队行军和作战知识。完成后便分派到不同的单位，有些到美军招待所，有些到后勤补给部，我和一些同学第一批被派到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军。

1944年1月，我们三十多人乘美军运输机飞越驼峰到印度，辗转到达中国驻印军总部所在地蓝伽。全体同学到了司令部后再分配任务，我和黄振威被分派到前线指挥部。那时中国军队刚收复孟关，遍野荒凉，日本兵的尸体布满在路边仅有薄土掩埋，尸臭难闻。孟关原为日本精锐部队十八师团驻守，但被孙立人将军指挥的军队打得惨败。当日，我和黄振威二人坐在路边，我们正在闲聊间，突然有一穿军装老人背着卡宾枪带着一队人走来，原来是史迪威将军从前线回来，他穿着普通军人的服装，与一般美国军人差不多。当天晚饭的菜很丰富，我和黄振威吃得很高兴，但亦很奇怪行军途中为何有这么丰富的晚饭。于是我找一位美国联络官询问，他说你们今天有运，原来那天是史迪威将军的生日，所以司令部特别准备丰富的食物庆

祝一番。

史迪威将军在1883年3月19日出生，所以这天应是1944年3月19日。第二天我和黄振威就正式分派任务，我被派至保护前线指挥所的高射炮部队，黄振威留在总指挥部。我们随着军队前进，日本当时仍有战机空袭，当警报响起时便准备射击。我们的高射炮射程不是很高，日本战机一般都飞得很高，所以未曾击落日机。高射炮部队里，每个连有一名美军联络官和一名翻译官，凡是连上日常作战、训练、补给等工作，都会由联络官向连长交代指令，部队有什么向总部报告也得通过联络官。在部队里通常在营级才会有联络官，高射炮连由于直属指挥部，所以连级也有联络官。与我接触的联络官先后有三位。我现在只记得其中二人。一位是Kose，是犹太人，中尉官阶，后来来了一个叫Hunt，是中校。他的军阶很高，被派到高射炮连是因为他行将退役，没有特别的任务，所以派他到总指挥部。在高射炮连一般都是由中尉担任联络官的。凡是部队的补给、军火、给养等都由联络官与总部联络。总指挥部有直属的炮兵营、战车营、高射炮营、辎重营等，由指挥部调动可随时支持前线步兵。密支那机场收复后，总指挥部马上用军机空运高射炮连到机场，保护机场免受日战机空袭。我随高射炮连进驻密支那机场，是第一批空运到密支那机场的部队。1944年8月密支那收复后，作战部队渡过伊洛瓦底江前进，伊洛瓦底江面开阔，工兵搭建浮桥让部队过江，我们高射炮连就在桥头架炮以防日机来袭破坏浮桥。总指挥部进驻八莫，我们亦随之进驻八莫，一直至1945年5月缅甸及滇西

□ 口述历史

反攻战役胜利后才回驻昆明。回昆明后部队改编为105榴弹炮营，派到黄土坡炮兵训练中心学习榴弹炮射击。我在中心当翻译官，陪美军教官上课，一班大约有40人。8月15日我们正在上课，广播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欣喜若狂，一群翻译官坐美军吉普车到城内庆祝，昆明市内全民欢腾，我们感受到一生难忘的狂欢。

到了10月，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正式通知我们退役，我跟着到重庆找工作，在中央银行总行出任文员，中央银行随后迁回上海，我则在1947年派到香港协助处理国民政府还款给英国事务。当年中国曾向英

国借款6亿白银，以中国八项出口物资如桐油、茶叶、钨锑等金属抵偿，这些物资由中国内陆运到香港出口，中央银行派员到香港负责检查和核数。中央银行迁台后，我留在香港加入金城银行工作，这是公私合营银行，归中国银行管辖。我在改革开放后才重返湖南湘潭故乡与亲人相聚。

我生长在中国的动乱时代，日本侵略中国，人民为了逃难流离失所，在战场上目睹尸横遍野。战争是残酷的，最好能避免，但国难当前时，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一代青年参军也是义无反顾的。

2011年3月17日访问

杨津基先生“文革”蒙难纪事

○顾廉楚（1950电机）口述 钱家骊（1953电机）整理

1968年4月，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团派”和“414派”已由文斗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武斗，两派都有了自己的武装据点。此时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已纷纷逃离学校避难。但杨津基先生此时却不知为何，可能是没估计到即将到来的危险，还留在清华的家中。

一天“团派”的几个武斗学生突然来到杨先生家中，在说过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后，直截了当地要杨先生捐钱支持“团派”的武斗。此时杨先生断然拒绝，他说我绝不用钱赞助武斗，我只会捐钱作党费。几个学生恼羞成怒，要带走杨先生关押起来。杨先生就只能带着盥洗用具和随身换洗衣服和四卷《毛泽东选集》跟学生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00多天。

开始时，杨先生被关到生物馆顶层，

此处没有窗户，闷热异常。关在这里，根本就无人过问，大概学生都忙于武斗了。钱和粮票则由杨先生的孩子杨健托红卫兵交钱购买。睡觉则只能睡双层木板床，没有被褥。不久又被转移到生物馆三楼，这是一个大房间，用很多纸板隔成一个小一个小房间。由纸板的缝隙可以知道这里关了不少人，在一边缝隙里可看见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物理教研组的何成钧先生等人，还可以看见何先生不断地叹气。和杨先生关在一起的还有我。他们虽处于逆境，也不知未来的命运，但两人还是常聊起“文化大革命”到了全面武斗阶段，今后该怎么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今后还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不禁都忧国忧民起来。

随着武斗不断升级，杨先生和顾廉楚老师又被转移到“团派”另一个武斗据